

《东北文学》的艰难创刊及历史贡献

王翠荣

【作者简介】王翠荣,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原文出处】《新文学史料》(京),2023.2.194~199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七七事变前后东北新闻界对日本新闻侵略的抵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7BXW017。

一

《东北文学》于1945年12月1日在长春创刊,由国民图书公司刊行,至1946年4月共出版了5期。该刊固定设置的栏目有《小说》《诗》《散文》,从第2期开始陆续有《杂文》《论坛》《评文》《剧》《名著介绍》《世界作家介绍》等栏目。《东北文学》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从办刊起便阐明其“既不是为某部分人垄断的同人杂志,也不是为某个团体专属的宣传刊物。它广泛的有待于从各角落各方面掷以协力,而是东北爱好文学,并在为文学献身而工作的同路者的总集体”。^①创刊伊始,该刊便希望摆脱小圈子的“同人”刊物的拘囿,不标榜文学流派的口号,力图将刊物打造成东北文学创作者的发表园地。

据李正中回忆,1945年9月初,即东北刚刚挣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之际,李正中、张文华、张戈禾、方季良等聚集在长春国民书店的小楼上,计划出版一本文学刊物,拟定名为《东北文学》,月刊,十六开本,每期100页,约容纳文稿12万字,并商定创刊号于10月上旬问世,拟由张文华(张露薇)、张辛实、张戈禾、但娣(本名田琳)、朱媿(本名张杏娟)、方季良(本名满达人)、韦长明(本名李正中)组成编辑委员会,轮流任执行主编,国民书店负责印刷出版和发行,编委每人每期需提出一至两篇作品,各编委广泛联系作者并约稿,创刊号由李正中做执行主编。

尽管出版方案已初步确定,但由于相对动荡的局势和复杂的人事变动,后续的稿件采集和出

版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这时的长春还有苏联红军,社会治安还没有完全好转,白天持械行抢的事情时有发生,入夜街上阒无人声。有些人由于各方面原因迁居了,为了找到一个人

不要碰几次壁;找到了的人或是因时局不明朗不愿轻率执笔,或是因于经济生活失掉来源而无暇顾此。总之,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纷至沓来,急得我焦头烂额。有一次到田琳的新居去,找到房子却找不到入口,原来他们出于安全计把外边和里边的门全堵死了。我只好听从指挥跳过墙又爬进窗子,才会到了主人。大家取笑说,这样跳墙爬窗约稿也算得上是文坛奇闻了。^②

即使经过多方努力,到了预定发刊的时间,李正中搜集到的稿件却不满60页。更为棘手的是,原定7人组成的编委会只剩李正中一人全权负责,最终延迟到12月1日得以正式出版。李正中为创刊号撰写“编辑后记”时署笔名“吴翼”,算是对“羽



翼全无”的自嘲。

《东北文学》创刊号封面由画家董风设计。刊名“东北文学”居中竖排,右上方标注出版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刷发行(月刊杂志)”,右下方标注出版方“国民书局长春总局”,左下方注明“创刊号”;封二在视觉中心处放置了一幅“观景殿的阿波罗”雕像画;两个目录页文章标题及页码下方分别附了两幅表现战争场景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图画。尽管未见史料阐释这些插图,但从插图选择太阳神阿波罗以及表现“战争”“抵抗”类主题来看,该刊表达了对伪满时期的抗争、对“光明”的热爱和追求。如李正中所言,“它出生于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即将爆发,天空一片阴霾的动荡年月。现在看起来,与其说它开创着东北当代文学的先河,还不如说它是东北沦陷期文学的继续。”^③这在《东北文学》发刊词中也有体现:

为了不耐晨光到来之际的沉闷的昏睡,乃有人敲起洪壮的□钟,为了要突破眼前的充斥于文学界的混沌状态,我们便发刊了《东北文学》。《东北文学》是为呼应建设中国文学的巨涛,而作为同运动的一支军旅而产生的。在“文学”之上虽冠以“东北”,但并非意味着割据的或是门阀的。反之,正欲以此一份微弱的力量,来参与创建中国文学的大业……我们

深悉从事架空的文学理论,但我们也绝不反对与创作相辅并进的正确的道标;我们并不以浅腐的几篇创作便为满足,但我们却相信唯有赤裸的献出来真实的作品,才能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发刊词反映

了《东北文学》创刊的动因,饱蘸着对东北回归祖国怀抱的浓烈情感,期待呼应中国文学的脉搏,与之同频共振,同时表达了对伪满时期所营造的虚假文学作品反感,呼唤回归淳朴的现实主义文风。

二

《东北文学》创刊号除广告页之外,总计105页,刊载了5篇小说、5首诗和2篇散文,其间穿插了5篇关于世界著名作家的介绍: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文学家华莱里(今译瓦雷里)、德国作家歌德、英国作家利敦以及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创刊号的卷首诗是吴桐的《祖国》,这首诗用象征性的笔法回顾了祖国遭受的磨难,笔锋直指刚刚被赶出中国国土的日本侵略者: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巨汉/所背负的历史有五千年/他的身上既不知道疲倦/他的心里也不晓得厌烦/他只是在瞪着两只大眼/有时候仰望头上的青天/有时候俯瞰脚下的山川/嘴里却从来不曾发一言/就是有贼人来掠夺疆边/他也悠悠然竟装着不管/但生了气时便抬起大脚/把东瀛的小岛一下踢翻/现在好如由梦中醒来一般/他抖擻掉了浑身的懒/虽然步伐是有些迟慢/却迈开大脚一直地向前……^④

由于首期杂志的稿源不足,李正中加进朱媿的《小银子和她的家族》和韦长明的《诱惑》来补足版面,这两篇小说均在伪满时期被退稿、撕页或删改,《东北文学》创刊号的这一困境反而使读者得以窥见原文全貌。

据李正中回忆,朱媿的《小银子和她的家族》,是抗战胜利三年之前写给《新满洲》杂志的《妇女作品特辑》的,由于付印之前被弘报处发现,“杂志社附着版面设计和插图退给了作者,后来朱媿把它编进了短篇小说集《樱》,这时还没有出书,于是把它抢先一步发表在《东北文学》上来充实一下”^⑤;《诱惑》则是李正中1944年写的一个四万字的中篇,曾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但在连载第一部分时,印刷完了的杂志被命令撕掉小说的第一页,以至于作者慨叹:“这样的‘无头鬼’真比干脆禁止出售还难堪。尤其恶毒的



是书报检查老爷用毛笔在原稿上把以后章节中有关伪宪警贪赃枉法、买办资本家蹂躏妇女,市场萧条,民不聊生……这些作为时代背景和故事发展缘由的片片断断全给涂抹得不可辨认,相继在《新潮》上发表的总共只有两万字。”^⑥

以上两篇小说在伪满时期的坎坷经历恰恰是当时众多爱国文学青年共同困境的缩影。1941年3月23日,伪满国务院弘报处制定并发布了《艺文指导要纲》,该纲领实际上是一个强化殖民主义思想,实行文化专制,镇压抗日爱国文艺活动的反动纲领。《要纲》中提出了“八不主义”：“不准描写社会黑暗”，“不许写悲观和失望”，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等等。因此，记录知识分子苦闷和普通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被伪满当局恶意处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情景在杨絮(本名杨宪之)的《关于〈我的日记〉的被扣押》、方季良的《“灵草”和我》以及韦长明的《这都是为了我的〈七月〉》中也有提及。《我的日记》印出样书后被伪警察厅扣押,因其有一些关于私人情感的表达以及揭露伪满文化汉奸丑态的文字;诗集《灵草》因私自印售而遭到伪奉天警察厅特务科搜查,并于1945年1月被扣押;诗集《七月》因未经弘报处审批,私印私售而被告密检举,由弘报处交警察厅特务科扣押,还被列出三大罪状:“第一,书中的年代,俱系中华年代;第二,《霜花》一篇,寓意于弱小者的反抗;第三,书名《七月》,在响应着卢沟桥事变的七月”^⑦……当时的文学创作受各种禁锢,凡是有伤伪满国体、思想主题违背“王道乐土”,作者便会遭受质询甚至拘禁。因此方季良感叹道: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句黑暗,不要期望光明,更不要说你的希望,你那坦白的纯洁的对你未来的忠实的表白,你的忍痛,你那被非人道的压迫的忍痛……使它腐烂到肚子里,使它不做一些许的散发,我们一个无言的牛马,去做永为人所驾役的奴隶生活。^⑧

《东北文学》的很多作品充盈着对殖民统治者的控诉以及挣脱牢笼、迎接新生活的欢欣快乐之情。

李正中在“八一五”光复当天写下了长诗《从你的尸身上踏过去》,诗歌以“你,你这可憎的东西/昨天你犹在我的面前巍然屹立,今天你却一声不响地倒下/来吧,让我从你的尸身上踏过去”作为铺垫,详细叙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种种掠夺行径,同时严厉批判了伪满时期所谓的“协和”“大东亚共荣”:

你一边虚情假意地把我拉到一起,先说我的爹娘如何把我遗忘,又是如何作恶多端/然后说:我们还得合作呀!我是手足的弟兄呀!/你一边毁掉了我磨快了了的锋利的刀/你一边发着豪笑/拍一拍你的屁股,露出了黑口径的手枪……^⑨

而当胜利来临之时,爱国的青年作家们将劫后余生的喜悦诉诸笔端。张文华的《胜利之歌》开篇便乐观地直抒胸臆:“不必想那过去的酸辛/也不必想那未来的快乐/如今我们战胜了仇敌/只管高唱着胜利之歌”^⑩;李正中在诗歌《挣脱灵魂的枷锁》中抒发了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迎着破晓了的世纪的晨光/弟兄们携起手来吧/挣脱掉灵魂的枷锁/我们要追寻那许许多多伟大的生活”^⑪……庆祝胜利之余,作家们也对东北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屹夫的散文《灵魂的翅膀依稀在高翔着》这样写道:

东北光复了,这是事实。造成这事实的,是祖国八年的血泪的抗战。八年来长期的抗战,已把这盘散沙团结起来了,也把这睡狮惊醒了。“战争”是结束了,祖国也由此次的抗战胜利而取得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交椅,这在感情上因[因]然是够叫我们兴奋的,然而,我们如果再平心静气的、理智的想一想看,我们真能以匹敌其他四大强国吗?我们的实质真能够得上强国吗?

尽管日本侵略者撤出中国东北后,广大东北民众摆脱了异族的压迫和奴役,但因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各方势力的进入,很多百姓仍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关注现实的作家们难免滋生出感时忧国的情愫,这在常江的长篇报告文学《从吉林回来》中体现得较为鲜明。常江以文化人的身份从长春回到家乡吉林

做调研,如实记载所见所闻:沿途到处是“被破坏、被烧掉的房舍”,特别是被日寇用过的工厂“连建筑物的顶端都给拆掉了去”,乘坐的列车里也满目疮痍,座椅是后钉的白木板,以至于坐下后“把衣服挂住了叫人站不起来”,“车上的窗帘也完全被割掉了”;走在街上,身边经常会传来清脆的枪声,店铺的老板勉强维持着生计,为了躲避强盗的抢掠,天一黑便赶紧闭店,致使晚上“六点以后是死的世界”……老百姓们盼的是赶紧过上太平日子,墙上刷着“吉林是吉林人的吉林,反对强制接收”“拥护由吉林人民成立民主的省市市政府”等标语。这些记述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光复”初期的混乱状态。

三

《东北文学》成为人们离开伪满文化沙漠后发现的一块绿洲,慰藉了当时众多饥渴的文学爱好者的心理。尽管李正中认为“创刊号集稿的时期比较短促,而且又正当着大局安定不久交通机构还没有恢复的状态中,以致我们想要联络的好多写作的朋友们,都因而失却了联络的方法”,从而导致“异常贫弱”;而且由于铁路交通不畅,这份杂志只运销到大连、沈阳、吉林、哈尔滨等较大的城市和附近少数县城,但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踊跃购买。李正中曾回忆起这一盛况:“当时书店定价是十块钱一本,我担心它太贵卖不出去。结果不到一个月,三千册全都卖掉了!到了第二年年年初,每月都能收到五六十份稿件和信函,我又高兴又激动,发誓一定要把它办下去。”^⑩

《东北文学》坚持出版5期后,由于长春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担任主编的李正中离开长春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而终止。

据笔者统计,5期《东北文学》共刊载110余篇作品,其中小说23篇,散文31篇,诗歌24篇,杂文8篇,文学评论14篇,世界作家介绍及评论8篇,剧作1篇,编后记5篇。除执行主编李正中外,比较活跃的作者还有但娣、朱媿、方季良、杨絮、蓝苓(本名朱堃华)、乙

梅、姚远、田兵、孟语、韩护、金羽、君颐等。因为稿件来源有限,部分文章是一个人换着笔名来刊发的。如方季良分别使用笔名“舍黎”和“大字”发表了小说《吕干娘身边底人们》和《拓荒》,李正中用了“韦长明”“方之华”“林里”“葛宛华”“魏之吉”“万年青”“常春藤”等诸多笔名,他曾回忆:“我主编过五期《东北文学》,用了三四十个笔名。为什么呢?我去组稿,却找不到人写,就换着名字自己写。”^⑪但目前难以全部考证这些笔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北文学》并未完全实现创刊时的目标,但这份刊物仍成为特殊历史时期恢复和建设东北文学的主要阵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伪满文学的窘境。正如《东北文学》的一位读者的评价:

在过去东北文化太可怜了。一个康德文学,艺文政策,闹了个乌烟瘴气,不是协和,就是增产,再是储蓄,又是什么建国十周年,整个的文坛,无不种了这些毒素,竟使人读之言之,实在哀痛不已!直到现在,伴随于东北光复,我们才吐出一口舒服气,有话该说了,有话也该写了。《东北文学》是震动这光复后的东北文坛第一炮,它是负有东北文化振兴的一翼而诞生的,从一个读者的小我来看,那是再没有过于这个喜悦的了。^⑫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文学》从第2期起陆续刊载了7篇文论^⑬,以文学创作的几种常见体裁入手,系统地回顾了东北沦陷时期的创作概况,如姚远在《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中慨叹东北沦陷期间文学创作者在重压下的无奈,又肯定了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东北的所有人民,在日寇的帝国主义的重压下,只有痛苦的呻吟,无力的挣扎,我们这群人,如同是在暗夜里爬行的旅人,失掉了前进的目标,更如同是在暴风雨里的航海者,勉强摸索着向前航行,已失掉了前进的重心,所谓生活,不过是被奴役着的空间与时间所造成的苦痛,倘如承认文学是有着反映时代

与现实生活的使命的话。那么,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也就失掉它的本性了。看!东北的文学,不是也被日寇利用为奴役的工具了吗?从事于文学的人,不是也被强迫着而予以统治了吗?

然而,文学者是有思想而工于写作的,虽然处于这样恶劣的环境,笔尖的滑行都被监视着,但是毕竟实践了文学者的使命。利用凡有的机会,借题发挥了文学者的本色。他们利用报纸,刊行杂志,在东北的各个角落里,向着各层级的人们,呼喊了。他们的地盘有报章,有杂志,有不定期刊物,有单行本……^⑩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在缅怀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文学青年的同时,也表达了未来建设东北文坛的决心:

未来的工作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热,是向往这工作的,我们的灵魂,愿为这工作而献出的。所谓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的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的建设文学的使命,披于有志于文学的每个青年的肩上。开垦我们的文坛,发掘我们的人性,建设我们的东北。东北重归于祖国的怀抱,我们不愿一任感情的狂呼,我们更要冷静的思索,一面复元,一面建设,以尽国民的责任于万一。^⑪

此外,李正中在《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中充分肯定了东北沦陷期间的女性文学,尤其是萧红的创作:“东北女性文学已经是冲起了一泓活流而也收获了丰腴的果实”;东北女性文学作家的代表悄吟(即萧红)“写出了小市民的悲哀和东北农村的破产,实给予了沉闷中的东北文学者以极大的冲动。她为了夺取自身的光明的未来而对封建势力下的家庭抗衡,所以,在她的文字之中也用朴素的笔把光明捐给了读者”……

这些文论既有宏观角度的对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回顾和探讨,又有微观视野的对个别作家作品的点评及推介,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伪满时期作家的得失和在当时文学界的影响。萧军曾评价

《东北文学》作家的创作“停留在个人感情和思想的圈子里……需要和更广阔的生活去接触”,同时也肯定了《东北文学》:“这里面有着很多有才能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写得很动人……我感到很喜悦”。^⑫

《东北文学》只存在了短短的5个月时间,其刊登的文学作品主题狭窄,内容相对单薄,但客观再现了特殊年代文学青年的心理状态,为学界提供了必要的文学史料参考。

注释:

①《发刊词》,《东北文学》,1945年12月第1期。

②③⑤⑥韦长明:《〈东北文学〉发刊前后》,《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6年第3期,第108—109页。

④吴桐:《祖国》,《东北文学》,1945年12月第1期,第2页。

⑦韦长明:《这都是为了我的“七月”》,《东北文学》1946年第3期,第24页。

⑧方季良:《“灵草”和我》,《东北文学》1946年第3期,第21页。

⑨韦长明:《从你的尸身上踏过去》,《东北文学》第3期,第8—9页。

⑩张文华:《胜利之歌》,《东北文学》1945年12月第1期,第35页。

⑪韦长明:《挣脱灵魂的枷锁》,《东北文学》1946年1月第2期,第31页。

⑫⑬李正中口述,陈言整理:《从殖民现场体验到后殖民省思——李正中访谈录》,《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⑭晓戈:《有感一题》,《东北文学》1946年第2期,第8页。

⑮即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林里《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李文湘《过去十四年的诗坛》、陶君《东北童话十四年》、孟伯《译文十四年小记》、孟语《沦陷中的东北戏剧》、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⑯⑰《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东北文学》1946年第2期,第76—84页。

⑱萧军:《萧军全集》(19)第2辑四十年代(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742页。